

性格如何塑造和毁灭美国总统

双刃剑

How Character Makes
and Ruins Presidents,
from Washington
to Clinton

THE DOUBLE-EDGED SWORD

ROBERT SHOGAN

[美] 罗伯特·肖甘 著
张峰 译

北京出版社

How Character Makes
and Ruins Presidents,
from Washington
to Clinton

双刃剑

THE DOUBLE-EDGED SWORD

性格如何塑造和毁灭美国总统

How Character Makes and Ruins
Presidents, from Washington to Clinton

ROBERT SHOGAN

[美] 罗伯特·肖甘 著
张峰 译

■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双刃剑：性格如何塑造和毁灭美国总统 / (美) 肖甘著；张峰译.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1
ISBN 7-200-04236-6

I. 双… II ①肖…②张… III. 总统—性格—研究—美国 IV. B84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4566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00-2384

Copyright: ©2000 by Robert Shoga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RANDT & BRANDT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and Beijing International Rights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0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2000 年中文简体字版，经由 Robert Shogan 授权北京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双刃剑

——性格如何塑造和毁灭美国总统

SHUANG REN JIAN

〔美〕罗伯特·肖甘 著

张 峰 译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市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223 000 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 000

ISBN 7-200-04236-6

B·82 定价：16.00 元

我告诉我的朋友们，我正在写一本关于总统性格的书，许多人都会心地笑了，同时提到围绕比尔·克林顿个人行为的似乎无休止的争论，并祝贺我有这种抓住机遇的感觉。实际上，早在克林顿入主白宫之前很久，我就开始思考总统性格的重要性——林登·约翰逊和理查德·尼克松都曾取得过压倒性的胜利，但担任总统后却导致灾难性的结局，这似乎根源于他们的天性。在我看来，这意味着，要想了解总统就必须先了解总统性格和总统政绩之间的关系。我在本书中努力考察的正是这种联系。

许多人对我完成这一任务给予了帮助。我要特别感谢自由论坛主席查尔斯·奥弗比。他鼓励我研究这一课题，并帮助我得到了媒体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的职位，使得我能够完成本书的工作。我还要感谢我在媒体研究中心的所有同事，特别是研究主任劳伦斯·T.麦吉尔，他保证我得到了我所需要的一切资料；门罗·普赖斯，给我以鼓励、明智的忠告和友谊；还有我的研究人员艾莉娜·奥。我还要感谢曾与我一起工作了25年多的《洛杉矶时报》的

编辑们，特别是华盛顿分社社长多伊尔·麦克马纳斯，他非常灵活地给了我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这一课题。还有唐·弗雷德里克，他编辑了我发表于该报的文章，有助于我更好地说明我要表达的意思；还需要感谢的是我的一些记者同事，特别是罗恩·奥斯特罗夫和戴维·威廉。在西方评论出版社，利奥·威格曼很早就对本书感兴趣，克里斯丁·米拉维克和米歇尔·温使手稿得以付梓成书，这些都使我获益匪浅。还要感谢我的代理人和助手卡尔布兰特及他的同事玛丽安娜·默罗拉。当然，我最为感谢的还应是我的妻子艾伦，她一如既往地总是充当我著作的第一个读者和我最好的朋友。

罗伯特·肖甘

作者简介

罗伯特·肖甘 美国著名政治记者，活跃在美国新闻界已有30余年，对七任总统进行过亲身采访，曾为美国《新闻周刊》主笔，现为《洛杉矶时报》工作。《双刃剑》是他的第七部关于美国总统的著述。肖甘还是华尔街杂志的副刊主编，并担任由志愿人员组成的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的美国政府代表机构和平队的测评官员。



责任编辑 杨 钢
封面设计 阎 华
责任印制 李 芸
李文宗

目 录

- 第一章 终极武器 / 1
- 第二章 父亲般的人物 / 13
- 第三章 “两面派的烟雾” / 36
- 第四章 寻求危机 / 61
- 第五章 “被上帝做了精神调理” / 85
- 第六章 有个人魅力的王子 / 119
- 第七章 出气筒 / 151
- 第八章 虔信者 / 178
- 第九章 无信仰者 / 197
- 第十章 变幻无常的总统 / 223
- 第十一章 “慢慢说出实话” / 257

第一章

终极武器

如果说共和党候选人鲍勃·多尔有机会赢得美国总统职位的话，那么，这个机会就是 1996 年总统竞选期间他同比尔·克林顿的第一次电视辩论，但这个机会稍纵即逝。当时会议主持人吉姆·莱勒在辩论双方对峙的情况下插话问道：多尔是否认为，他和克林顿之间“在更多的个人的事情上”存在着重要的差别呢？

多尔停顿了一会儿，全国各地焦急的民主党人都屏住了呼吸，而共和党人的脉搏却兴奋地剧烈跳动。“性格问题”，克林顿阵营的这个颈动脉已经暴露出来，多尔已经握住了一把匕首。他只需要把它投出去便可。

但民主党人不必担心，多尔根本没有投出匕首的意图。“我不喜欢介入私人事务，”多尔说，“就我所关心的而言，现在进行的是一场关于公共问题的竞选。”多尔的这番话受到了助手们的责备，因而在 10 天后的第二次辩论中他极力重新提出性格问题。但他对总统的漫无目标的批评，却未能达到所需要的证明克林顿不适合入主白宫的目的。尽管在竞选即将结束的日子里，新一轮的丑闻败坏了克林顿的名声，但多尔失败的结局却是无可挽回的了。

这次机遇的丧失，把由多尔的挫折和克林顿的成功所证明的总统政治学的一个重大之谜突现出来。富兰克林·罗斯福称

总统职位“首先是道德领导的领域”。沃尔特·迪安·伯纳姆把我们的第一行政官叫做“美国文明宗教的高级牧师”。另外，两党的政治职业人士也一致认为，在现行的政治体制里，实质性的竞选誓言的意义，已经被政治家反复证明的无力履行其诺言的事实所破坏，使得性格成了总统选举中的基本问题。

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个谜：如果无数的民意测验都证明了人们的直觉判断是对的，即绝大多数选民把在职者视为不怎么诚实的、不怎么可信的、不怎么可能坚持自己的信念的人，一句话，是一个有着比他的挑战者更脆弱的性格的人，克林顿怎么会击败多尔呢？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导致另一个谜，而且这个谜正是克林顿本人向我提出来的。早在1992年总统竞选期间，我有机会同当时的阿肯色州州长克林顿单独面谈。我问他，他是否认为一个候选人的个人行为可以可靠地预示着他作为一个总统的表现。

“这是每一个美国人都不得不亲自回答的一个问题，”他说，“但我要反问的是，新闻界有什么真正的理由如此关切地穷追不舍这些事情呢？”

这是一个机智的回答，打算把对所谓性格问题的责任推给新闻界，而不是推给候选人。此外，由于关于性格的争论在他总统任期内一直很热烈，从金妮飞·弗劳尔斯案和白水丑闻、葆拉·琼斯案、1996年竞选滥用募集资金，最终到他和白宫实习生莫尼卡·莱温斯基奇异的调情，克林顿老是向他的批评者挑战，甚至想方设法把自己打扮成中产阶级价值观和美德的模范。

但克林顿在总统职位的布道坛上的说教，同已经损害自己名望的个人错误以及为政治欺骗所做的辩解之间是矛盾的，这种矛盾只能进一步突出在我们的谈话中他提出的那个棘手问题

的重要性：总统性格和总统表现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

5年多来围绕克林顿而产生的众多丑闻给他当初竞争总统的追求罩上了一层阴霾。20多年前吉米·卡特是靠决不说一句谎言的诺言而入主白宫的。5年过去了，20多年也过去了，总统性格和总统表现之间的关系问题仍然需要回答。

非常需要的，也是本书将努力提供的，是明确解释所谓的性格问题以及与此相缠绕在一起的价值观问题——二者一起使所有关于政治的公共争论丰富多彩起来——是如何同政治程序和政治运作联系起来的。我从两个角度来考察这种联系：第一，揭示总统性格的优点和弱点如何导致总统的优劣表现；第二，考察总统及其对手在政治舞台上如何利用公众对总统性格和价值观的知觉来操纵政治听众——新闻界和选民。

本书将证明，性格是一把双刃剑，既是一种能使总统名誉扫地并破坏他的信誉的工具，也是一种能被总统用来确立自己政治地位并动员民众支持的工具。总之，性格与价值观相结合，是现代美国政治的终级武器。

当然，自乔治·华盛顿就任总统以来，总统性格一直是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一个重要方面。美国人民一直期望他们的总统，而且在较低的程度上也期望其他公职人员值得公众信任。这些人不仅要作为政治领袖，而且也要作为个人行为的角色榜样，成为培养孩子的标准。的确，本书将表明，正是华盛顿的性格为他最早占据的职位奠定了宪法基础。农民如果不信任华盛顿，就不会授予这位第一行政官有执掌这一职位的哪怕有限的权力。华盛顿一旦就职，就通过他的性格使总统职位有了特权，而这种特权也使得这一职位存活了两个多世纪。当然某些继承华盛顿衣钵的人的行为是盛名难副的。

不止于此，本书还将表明，在华盛顿的每一个最重要的后继者的身上，性格不仅决定着他们的表现，而且还有助于重新

界定作为一种制度的总统职位。因此，托马斯·杰斐逊乖僻的天性给总统职位增添了一种直到今天仍延续的诡计多端的意味。安德鲁·杰克逊好战的个性确立了总统职位的民粹主义的方面，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无比自信促使这一国家最高官职成了普通公民生活中的一个现实。

但随着新千年的接近，性格和价值观已经具有了华盛顿和奠基之父们从没有考虑过的一种意义。1996年总统竞选中两党的战略证明了这一点。“家庭价值是一种常鸣的警言。”克林顿当时的劳动部长罗伯特·赖克在1996年选举临近时曾作出过这样的断言，“不管我们是否喜欢这一警言，它都喋喋不休地要人们引起注意。我预言，下一次选举将是围绕着如何界定家庭价值这个词展开的一场泰坦尼克号式的斗争。”

事实证明赖克是有先见之明的。在这场竞选中，共和党人多尔谴责好莱坞降低了美国文化水准。尽管多尔本人优柔寡断，但他的代理人却利用各种场合要人们注意重任在肩的总统的个人弱点，而民主党人克林顿也试图保护儿童免遭泛滥的电视影响，并利用他的提名大会再次肯定他的婚姻和他的家长责任。

甚至在竞选活动结束后，关于道德问题的骚动仍继续搅扰着公共舞台，人们提出了关于公共人物的个人行为的问题，并努力地显眼地展示各方面的社会标准。在选举后的几个月里，一个谋求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候选人，在其通奸关系败露之后被迫放弃了自己的要求。马萨诸塞州的国会议员约瑟夫·肯尼迪，美国最富传奇色彩的政治世家的最杰出的子孙，因为他的被宣告无效的婚姻引起的双重轰动和他兄弟迈克尔与一个十几岁的小保姆的调情，而不得不放弃了竞选他所在州州长的计划。

“你竞选官职，人民就要对你从生下来的那一天起的生活

进行评头论足。”肯尼迪的民主党之家同事、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乔·莫克利注意到这一点。没有人比比尔·克林顿更能理解这一格言的后果了。克林顿作为自罗斯福以来第一位赢得连任的民主党总统，不得不重新组织一个募集资金委员会谋求赞助，来解决为自己不良行为的辩解所需要的律师费用。因为即使按葆拉·科尔宾·琼斯一案援引的性骚扰法起诉他，他都会被免职。

然而，在克林顿作为总统候选人和第一行政官在国家政治舞台上的前6年，他似乎过着一种似有魔法保护的生活，因为他赢得了他的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后来又再度当选，入主白宫。“那些性格真正成问题的人，就是那些转移人民的注意力并使我们可爱的国家陷入分裂的人，”当他的性格第一次遭到抨击时他说了这样的话，断定所谓的他的不良行为的例子纯粹是小过失，对他在政坛上的表现没有任何影响。此后，克林顿大量地使用类似的论点——并且愤慨地否认有错误行为——来掩护自己，免遭间歇式的批评风暴。但后来，在他开始第二个任期的第二年，他不得不正视对他生活的最严厉的与性格有关的指控——他试图阻碍法官调查他和一个年轻的白宫实习生的暧昧关系。各种以前的争论对他的信誉累积起来的索账，似乎使他的总统职位陷入了极端的困境。

在某种法律的意义之上，当独立检查官肯尼思·斯塔尔指出克林顿有权被假定为无辜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赞同斯塔尔的观点。但在政治方面，尽管克林顿在丑闻爆发后几个月里的民意测验中有了不俗的表现，克林顿的民主党同伴仍担心公众能否长时期地给他在罪证不足的情况下被假定为无罪的权利。

白宫的性丑闻既反映了美国人为自己选举出来的官员设定的道德标准上的混乱，也加剧了这种混乱，特别是当它涉及到性行为的时候。《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梅格·格林菲尔德注意

到，“人民现在既要求性行为上的一切自由、开放和接受的权利，也要求隐私的权利。”

有人维护被指责有不良行为的政治家，责备对总统私人行为的关注类似于窥视者汤姆主义^①。他们认为，假如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和富兰克林·罗斯福谋求公职时，公众就已经知道了在他们卸任总统后才暴露的男女私情，国家也就不会得到他们的贡献了。

当然，蔑视规矩的行为不一定都是有意义的，但有些是有意义的。因此，领导美国进入狂飙的 20 世纪的沃伦·哈丁，有一个情妇，这本身无关紧要。但在哈丁去世后，这个情妇披露了他们的关系，反映了哈丁着迷于情感的需要。这种披露可以成为对丑陋的腐败的警告，因为这种腐败最终毁灭了一个由于害怕没有朋友而不愿同邪恶的朋友分手的总统。

学术研究进一步证明了总统的性格和价值观在决定竞选斗争和选民投票中日渐突出的作用。在过去，大多数政治学家都把白宫竞争者的个人品质看作是表面的因素，认为它们不如党派忠诚和决定选举结果的重要问题那样有意义。但党派效忠的腐蚀性和竞选问题争论的朦胧性，使得学者们更为看重候选人的个人品质。全国选举研究中心搜集了自 1952 年艾森豪威尔获得胜利以来 9 次总统选举的资料，在此基础上对总统候选人的评价进行了一项里程碑性的研究。该项研究的结论是，一个候选人的天性至少在 5 个方面对其在选举日吸引选票起重要的作用。这 5 个方面除了资格而外，还包括正直、可靠、非凡的领导能力和个人各方面因素（如候选人的年龄、举止和背景）的集成。

^① 窥视者汤姆系英国传说中的一个作裁缝的人物，因偷看戈迪瓦夫人裸体骑马过市而致双目失明。——译者注

当然，这些判断是非常主观的，正如该项研究注意到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选民在评价这些个人品质时，所依据的是他们自己已有的关于个人行为 and 总统表现的概念。沃尔特·李普曼在他的著名的《舆论》一书中指出：“我们并不看重具体的人和具体的晚年；我们注意的事情是抽象的人或晚年，并且主要是看我们在这些论题上已经有什么样的观念。”

该项研究的学者阿瑟·H. 米勒、马丁·P. 瓦滕伯格和奥克萨那·马伦区克说：“关于总统应是什么样子，人们有一种预先存在的知识结构或图式，并根据现实的候选人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符合这些图式的因素来判断他们。”他们还指出，性格品性对竞选的影响是一个自发滋长起来的过程的结果。“选民从他们对过去的总统的经验中抽象出这些特点和行为，并同政治成就联系起来，然后按照这些特点来评价其他候选人。”候选人在竞选中强调自己的某些特点，目的是想从选民那里获得有利的反应。“选民对这些竞选信息作出反应，不仅是因为这些信息与他们关于总统候选人的图式有关，而且也是因为这些信息是进行政治对话的词汇。”

人们公认，按照学术研究的解释，性格和价值观也是不定型的词汇，易于被误解。出于写好本书的目的，这里我对性格和价值观作出如下定义：

性格：政治家心理和个性的总和，是提供动机和聚光点的内部冲动。性格有许多方面，不仅仅是道德的等价物。在克林顿和多尔之间进行选择时，选民不得不把多尔值得称道的正直同克林顿的被信以为真的同情心进行平衡。

价值观：塑造个人和社会行为的、并且在政治舞台上具有新的突出地位的原则和信仰。总统依赖个人价值观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并经常利用公共价值观——如果这些价值观是和他们的性格相一致的话——如自由和平等，来争取民众支持。

性格和价值观是我们进行政治交流最有力的工具。它们是好还是坏，取决于如何运用它们，是否滥用它们。在里根－布什时代，共和党人似乎比他们的民主党对手更熟练地运用它们——并滥用它们。但民主党人也不甘落后，因为罗斯福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宣布有名的四项自由——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免遭贫困的自由和不畏惧的自由——是美国信仰的富有情感的象征。比尔·克林顿第一次谋求总统职位时也显示了同样的本领，把他自己的生活经历作为美国之梦的范例。在克林顿入主白宫的第一年，他极力维持这种论点，并有力地诉诸于中产阶级，不下70次地重复他的竞选诺言，要为“所有进行劳动、纳税、抚养孩子并照章办事的人”谋利益。

性格和价值观的积极方面是，如果负责任地运用它们，能帮助政治家们团结起来破除经常使政治程序陷于瘫痪的枷锁，并能帮助媒体启发读者和观众；不利的方面是，对性格和价值观的误用窒息了实质性的论点，歪曲了现实，并破坏了公众对政治和新闻界的信任。

无论如何，显而易见的是，不管是更好还是更坏，性格和价值观对总统职位以及对几乎所有其他国家公职和制度的影响都是无孔不入的和不断增长的。

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原因是意识形态差别和党派效忠的衰退。由大萧条^①所产生的、并被富兰克林·罗斯福辉煌地加以戏剧化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的分野，已经被经济福利抹平了。但共和党人——80年代的里根总统、90年代的白宫发言人纽特·金里奇，或他们不大出名的人物——却没能提供一种令人满意的替代品。其结果，美国政治漂浮不定，找不到一个哲学

① 指从1929年大约到1939年间发生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衰退。——译者注

的泊位。政府和社会的许多问题看起来都是棘手的，而围绕政策问题发生的争论像是没有结果的。

道德领域的骚乱同样重要。在 20 世纪即将结束的 10 年，使国家发生动摇的是一系列向行为标准挑战的震撼：艾滋病的风靡嘲弄了在 60 年代流行的性自由，华尔街丑闻污染了里根时代建立的兼并企业的辉煌形象，自我标榜为公共道德观念卫士的电子牧师暴露出肮脏的自我放纵，最近则是克林顿的白宫被丑闻污染的事件。

另一个促成因素是政治体制的日益开放性。随着政党衰落和总统权倾朝野，传媒已经成了一种权力经纪人，垄断着政治言论渠道的老板。

“这是一种不同的政治体制，”乔治·梅森大学政治科学家休·赫克罗认为，“没有哪个机构能够控制信息。候选人的全部行为已经是开放的，简直难以想像你能再找到这样的日子了。”

在这种环境中，政治家，特别是总统，打算使自己的公职人格化，利用通讯技术的爆炸提供的新交流渠道的优势，通过媒体去开发选民的情感。媒体抓住了一些同样的问题，却发现很难抵挡他们的策略。

总统总是享有特权，但在过去，人们是从远距离把他们看作是他们公职和他们行动的抽象代表。现代传媒，特别是电视，已经把他们扔进了我们家里，并且已经不成比例地膨胀了他们的人格。

然而，并非所有这种关注都是受欢迎的。如果说人格化的总统职位已经创造了文化英雄的话，那么它也产生了政治恶棍。如同冷战在 20 世纪的下半叶构成了核破坏的持久威胁，加强了对总统的关注（我们生存的机会似乎取决于总统）一样，民族的两大灾难——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生动地证明了性格缺陷和灾难性政策之间的联系。林登·约翰逊和理查德·尼